

收稿日期:2024-10-15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的乡村记忆与共同体建构

——以盐城籍作家为例

夏正娟

(盐城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盐城 224002)

摘要:穿越记忆的迷障,抵达有别于现实的浪漫、理想、美好的乡村共同体,是新世纪盐城乡土小说的基本叙事路径。小说中的乡村共同体,以传统乡村美德为要素,以家庭化、田园化为表征,以现代理性为话语表达方式,这显示出新世纪盐城籍作家尝试与社会现实对话的自觉意识。新世纪盐城籍作家重构乡村记忆,构建具有现代意义的乡土共同体,探索可与现代文明对话的新的文化脉络的尝试,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关键词:新世纪乡土小说;乡村记忆;共同体;盐城籍作家;传统乡村美德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5)01-0116-09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空间重组视阈下的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叙事研究”(21ZWB003)。

作者简介:夏正娟(1983—),女,江苏盐城人,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5.01.012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文坛出现了以曹文轩、鲁敏、王尧等为代表的颇具影响力的一批盐城籍作家。曹文轩是中国第一位获得“国际安徒生奖”的作家;鲁敏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冯牧文学奖等多个重要文学奖项,且一直颇受学界关注,王尧、吴俊、王春林、张学昕、杨庆祥等多位学者撰文评述;王尧历时二十年创作的长篇小说《民谣》甫一问世,就引起大批知名学者的注意,王春林、张学昕、程德培、张光芒等皆发文评析。曹文轩、鲁敏、王尧等创作的新世纪乡土小说多取材于盐城乡村的旧日生活。已有多位学者注意到这一创作现象,但相关研究以分析盐城民俗在小说中的审美呈现为主,而较少关注小说中乡村世界自足性、浪漫化、理想化的特点。穿越记忆的迷障,抵达有别于现实的浪漫、理想、美好的乡村共同体,是曹文轩、鲁敏、王尧等新世纪盐城籍作家文学想象的共同叙事路径。

一、基于记忆装置的乡村叙事

新世纪以来,已有多位盐城籍作家表示,家乡盐城是其创作的源泉。盐城河道纵横,被称为苏北水乡。曹文轩直言,其灵魂因水乡的滋养“不会干燥”,并宣称:“在我的脑海里所记存着的故

事,其中大半与水相关。水对我的价值绝非仅仅是生物意义上的。它参与了我之性格,我之脾气,我之人生观,我之美学情调的构造。”^{[1]21}王尧说:“故乡是我写作中的一粒种子,也是这粒种子最初的土壤。”^{[2]后记}鲁敏表示:“我的乡村叙事,以八十年代为背景,是乌托邦的,带有一点凄清的唯美色彩。东坝是我的老家,江苏东台的一个小说别称。”^[3]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世纪盐城乡土小说多是以作家的故乡记忆为背景展开叙事想象的。而记忆具有过滤旧日生活的功能,经由记忆,“昨日社会里最痛苦的方面已然被忘却了”^[4]。这种记忆想象模式,投射到盐城籍作家的文学创作中,主要表现为:在贫困中书写诗意,在苦难中发掘精神。

曹文轩提到家乡盐城时,常一言以蔽之,“我的家乡苏北,是以穷而出名”^{[1]19}。李有干对盐城的印象亦是“贫穷、荒凉”^{[5]323}。王尧谈及盐城,则感慨道,“虽然开始有了点生气,但贫困仍然随着日出日落,没有作息”^{[6]170}。盐城籍作家对家乡的贫困定位,与其贫困生活体验有直接关联。

曹文轩追忆年少经历时,曾反复提及其幼时生存之艰辛:

每天下午放学后,我肯定要背上用草绳结成的网包到田野、水边去寻找猪菜。不打足了猪菜,是不能回家的。我记得,常常是在月亮已上梢头时,才背着被揣得鼓囊囊的网包往家走。^[7]

回忆往日,我总能见到一个永恒的形象:一个瘦小而结实的男孩,穿着脏兮兮的破衣,表情木讷但又充满野性地站在泥泞的田野上……^[8]

从某种程度上说,贫穷与饥饿是曹文轩成长旋律中的基本音符。在李有干的记忆里,童年同样充满了贫穷与饥饿。王尧在追忆童年时,写下了与曹文轩、李有干等相似的贫困体验。在王尧的印象中,“那时候的衣物几乎很少没有补丁”^[9]。吊诡的是,新世纪盐城籍作家的童年贫困记忆并没有成为描绘苦难生活的“事实性”记录,而被赋予了独特的形态与意义。

我们在新世纪盐城乡土小说中随处可见作家童年贫困记忆的投射,比如打猪菜、喝稀粥、“出板油”等作家的童年生活经历,就频繁出现在小说人物身上。然而盐城籍作家既无心探讨乡土生存之艰难,也无意如莫言等作家一般由乡土生存逼视乡土“真实”,而倾向于对乡土生存作诗意化想象,以表达对已逝盐城地方文化的怀念。

曹文轩小说中村民的诸多生活方式,在今日之盐城多已不复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曹文轩小说呈现的内容,承担的不仅是民俗学的功能,更是对“忘却”的抵抗,对盐城乡土记忆的接续。以草房子意象为例,曹文轩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普通村民,居住在已被时代淘汰的草房子里,而富庶人家则住在瓦房里。可以说,草房子是其时底层人身份的象征。然而,当作家工笔画似地勾勒草房子时,因怀念而生的浪漫情感渐次主导了叙述的基调。甚而为了突显草房子的高贵,小说写道:“用这种草盖成的房子,是经久不朽的。这里的富庶人家,都攒下钱来去盖这种房子。”^[10]值得注意的是,油麻地最富庶人家盖的其实不是这种草房子,而是青砖瓦房。如果引入记忆装置,我们就不难理解这种叙述上的“漏洞”。基于童年记忆视角,我们会发现,作为童年记忆重要空间载体的草房子,在小说中不仅是人物的活动场景,更联结了“过去”与“现在”,是开启作家精神还乡之旅的钥匙。或言之,草房子意象既是写实的,又是理想的。

新世纪盐城籍作家诗意化书写已然逝去的乡村生活方式,凝聚其中的是追忆乡土的文学表达,在苦难生活中发掘向上、向善的精神力量,这些体现了盐城籍作家审视乡土内在视野的一致,都有意将乡土生存从日常生活中抽离,构建一个宁静平和、令人向往的乡土世界。

聚焦饥饿场景,是新时期乡土小说的重要叙事面向。莫言、张贤亮、刘震云等都曾对人饥饿时的生理与心理反应进行了细腻的描写,呈现出人生之荒凉。与莫言、张贤亮、刘震云等作家借饥饿探索人性不同,新世纪盐城籍作家着意于书写人在面对饥饿时,亦可最大程度地释放向善、

向美的情感力量。

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写蝗灾事件后大麦地人陷入饥饿的恐慌经历。有意味的是,小说悬置了青铜等人饥饿时的心理活动,而着力描写青铜为解决家人的温饱问题独自一人捕捉野鸭的事,其间被嘎鱼父亲诬陷偷鸭,他苦寻嘎鱼家丢失的公鸭以自证清白。随着青铜系列行动的渐次展开,青铜身上健康的、美好的人性力量也逐渐绽放成绚丽的花朵。

李有干《大芦荡》写“饥荒如同狂暴的风,肆无忌惮地扫荡着一切生命”^{[11]87}。与曹文轩的饥荒处理方式极为相似,李有干也没有从人的生存体验角度探索饥饿对人性的可能性挑战,而是着力描写一头牛如何为救主人撞石碾而死。牛死后,小说叙述者不禁感慨:“它死得那样坦然,那样悲壮,那样惊心动魄。它为使我和全家人不被饿死,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1]89}小说中,牛的死亡被赋予了向善的道德力量,为饥饿中的人们注入了活下去的勇气。

二、乡村共同体何以可能

“童年记忆的乡土,最是一片毫无异己感、威胁感的令人心神宁适的土地,也是人类不懈地寻找的那片土地。”^[12]新世纪盐城籍作家不仅写出了童年记忆乡土的理想性、乌托邦性,还以此为立足点,尝试构建一个衔接过去与现在,面向未来的乡村共同体。

(一)乡村的诗意命名

人类学家研究发现,人类早期的共同体有两个基本特征:“首先是‘与外界隔绝’的产物,其次,即使实在有,也是自我封闭的产物。”^[13]新世纪盐城小说中的乡村普遍表现出“与外界隔绝”的特征。盐城乡村多以当地大户姓氏命名。以曹文轩出生地盐城市学富镇为例,曹文轩为1954年生人,彼时学富镇尚为学富人民公社,计28个大队(行政村前身),其中18个大队以姓氏命名,如段村大队、林庄大队、车庄大队、曹舍大队^{[14]43-50}等。而新世纪盐城乡土小说中的乡村命名依据的却是乡村独特的地理环境与主要农作物,如曹文轩小说中的油麻地(《草房子》)、大麦地(《青铜葵花》)、小豆村(《山羊不吃天堂草》)、稻香渡(《细米》)、菊坡(《根鸟》)等,鲁敏笔下的东坝,李有干笔下的大芦荡等。这种命名方式具有田园诗般的浪漫格调,与现实中以姓氏命名村庄的写实风格拉开了距离,体现出作家营构“世外桃源”的叙事野心。易言之,新世纪盐城籍作家对乡村的诗意命名,显示出其欲建构一个区别于城市的乡村共同体的自觉意识。

(二)乡村美德的彰显

建构一个乡村共同体,自然不局限于空间命名的诗意化。彰显勤劳、质朴、善良的传统道德品质,肯定人与人之间互助、互依的和谐美好关系,都是新世纪盐城乡土小说凝聚共同体的核心要素。

盐城籍作家对美好人性、人情的想象,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与汪曾祺笔下的“高邮”。有所不同的是,“真诚”是沈从文与汪曾祺的文学理想,“湘西”与“高邮”的村民都在真诚地生活,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真诚地将自己交付给这个世界。从这个角度说,沈从文与汪曾祺小说都具有一种超越性,突破一般道德规范的限制,尝试最大程度地释放人物行为的自由度,从而展现出生命丰富、美好、自由的一面。而讨论新世纪盐城乡土小说,则需引用道德坐标进行观照。

鲁敏东坝小说的中心人物多为社会边缘者,他们或是孤儿,或身体有疾,但他们的精神世界却是丰富、自足的。值得注意的是,滋养这些边缘人物灵魂的,是传统乡村美德。《颠倒的时光》中的木丹是个孤儿,靠吃百家饭长大。在村里人的帮助下,木丹种植起大棚西瓜。收获的第一批

西瓜,木丹没有全数售卖,而是留下大半,尽数分给村民。同样,在哑巴来宝(《思无邪》)、哑巴开音(《纸醉》)等的言行中,也都可看到东坝人勤劳、善良、纯朴的美好德行。

成长是曹文轩与李有干小说的基本主题。成长小说总会涉及一个问题,何为成熟的生活样式?已有多位经典作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玛格丽特·米切尔《飘》将成长定性为对社会认知、价值认知与情感认知的意识与反思。丹尼尔·笛福《鲁滨逊漂流记》认为成长是一个建构独立于外在世界的精神世界的过程。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则用荒诞的笔法指出成长的一个重要标识,即意识到人类价值观的多元性,孤独是现代人无法逃避的宿命。

与上述成长小说不同,曹文轩常在伦理道德维度探讨成长问题,小说中人物的成长也会得到乡村主导道德力量的认证。曹文轩《草房子》中的杜小康突遭家庭变故,他家从村中首富一下子跌入底层。这样的人生经历使得杜小康获得了成长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突遭变故,杜小康的成长方向与玛格丽特·米切尔笔下的斯嘉丽不同,斯嘉丽的成长源于对美国南方主流社会认知与价值认知的反思,杜小康的成长则关系到传统乡村优良道德品质的延续。杜小康的故事围绕杜小康的两次孤独体验展开叙述。父亲杜雍和投资失败,杜小康被迫与原有生活方式剥离,陷入深深的孤独。为了改变境遇,杜雍和举债购入500只鸭子,杜小康与父亲一起远离人群到芦苇荡深处放鸭。如果说前一次孤独体验尚有富有烟火气息的乡村声音来缓解,后一次经历则是将杜小康彻底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在渺无人烟的芦苇荡中,孤独成了幽灵,时时在杜小康眼前徘徊。如果说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揭示了现代人无法回避的孤独困境,那么曹文轩则指出了摆脱孤独困境的路径。这条路径通向的不是笛福建构的独立精神世界,而是乡村某种优良道德品质。重回油麻地的杜小康用他瘦弱的肩膀担负起家庭的重担。这里杜小康责任感的萌生,显然有别于现代人对自由选择的自觉承担,而是与传统乡村家庭意识的觉醒是一体的。杜小康故事的结尾处设计了传统乡村道德力量的代表即油麻地小学校长桑乔对杜小康的认可,从而进一步强化了传统乡村道德力量对杜小康的形塑。

同样是热衷于讲述成长故事,与曹文轩将传统乡村美德视为摆脱现代人孤独、虚无生存困境的一剂良方不同,李有干对回归传统乡村美德的书写要更加自觉,也更为彻底。《蔷薇河》中“我”的成长过程以对孝顺的理解与践行为主要内容。“我”不满于爷爷强行将“我”留在身边,对爷爷生了憎恨之心,故意冷落爷爷。这个过程中,“我”目睹爷爷因“我”的有意疏离而痛苦,悔恨的情绪促使“我”反思之前的言行,最终理解了爷爷为何执意让“我”留在蔷薇河,也懂得了何为孝顺、何为蔷薇河。如同鲁敏、曹文轩等盐城作家,探讨传统乡村美德凝聚共同体的可能性,亦是李有干的最终叙述意图。《蔷薇河》没有止步于探讨“我”如何领悟孝顺、践行美德内涵,而是很快笔锋一转,将叙述焦点转移到父亲顺子身上。父亲对爷爷极为孝顺。父亲进城打工后,孝顺美德不但没有被现代伦理价值观侵蚀,反而生长出新的伦理情感类型,并成为凝聚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公司裁员,父亲虽占年龄优势,却将工作机会留给保安大爷。父亲将对爷爷的情感,转移到保安大爷身上,同样,保安大爷也将对子女的情感,寄托到父亲身上。父亲与保安大爷的情感关系,显然是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具象化呈现。父亲与保安大爷分享着共通的伦理情感。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父亲与保安大爷虽因对传统乡村美德的认同,确定了生命的意义,然而这种探索生命意义的方式,却是以牺牲自我意识为代价的。无论是父亲对爷爷的顺从,还是“我”对爷爷强制将“我”留在身边的理解,从某种程度上说,都是对传统乡村美德的认同,但同时也是物化自我的过程。

(三)盐城传统民俗的再现

如果说新世纪盐城籍作家尝试以传统乡村美德凝聚共同体,是在建构共同体的共同伦理价

值观,那么盐城民俗活动的反复再现,则显示出盐城籍作家建构共同体的自觉意识。

“民俗文化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的心态、语言和行为习惯,并在广泛的时空范围内流动。”^[15]民俗文化的集体性特征,在新世纪盐城乡土小说中主要表现为村民对乡村共同体的情感认同。《草房子》中,在油麻地,盖草房是件大事。油麻地人平日皆被各自生活琐事裹挟,一到盖草房,“全村的人几乎都出动了。他们割麦子的割麦子,上茅草的上茅草,拆房子的拆房子,测量的测量”^{[14]101}。盖房子的过程中,一种质朴的、原始的、美好的乡村情感就在油麻地每个村民间流动。这种集体性质的民俗活动形成的乡村共同体情感认同,既是稳定乡村共同体的情感基石,也是慰藉现代人孤独灵魂的精神力量。鲁敏在描写这类民俗活动时,也颇为注重展示村民的情感状态。《纸醉》中的四时八节,“屋檐下、门楣上、梁柱上、窗格上、镜角边、灯罩上,能贴能张处都要弄得花花绿绿才算数”^{[16]250-251}。鲁敏固然在写东坝人的贴纸花习俗,但同时也在书写东坝人生活的热情。而东坝人对生活的热爱,正是东坝共同体成为可能的前提。

如果说新世纪盐城乡土小说中集体性的民俗活动,承担了维系乡村共同体精神纽带的功能,那么丧葬仪式的书写则使乡村共同体表现出家庭化的特点。

新世纪盐城乡土小说再现丧葬仪式时,不仅细述其流程,还尤为关注丧葬仪式如何将散落的个体重新凝聚成一个大家庭。王尧《民谣》由“我”爷爷奶奶的故事讲起,呈现了中国家庭伦理结构的巨大变迁,家族结构由父子为中心向夫妻为中心转变。有意味的是,小说写奶奶丧葬仪式时,悬置了家人的悲伤,强化了“在奶奶的大殓仪式上,见到了许多我不曾见过的亲戚,我叫不出他们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的辈分”^{[2]186}。“我”未曾见过的亲戚,因奶奶的丧葬仪式聚集在一起,曾经的大家庭结构形态在这一刻得以复现。

与王尧小说中的丧葬仪式有所不同的是,曹文轩、鲁敏等更倾向于借助丧葬仪式将乡村塑造成一个大家庭。《草房子》重点书写秦大奶奶丧葬仪式中的守灵与封丁习俗。盐城守灵习俗指“人死后不能立即安葬,要停尸堂中,至少三天两夜。孝子孝孙日夜守护,即使夜深,也不能离开”^[17]。封丁习俗指“死者儿孙剪下头发少许,放入棺材的主钉眼内”^{[16]2667}。秦大奶奶无儿无孙,守灵与封丁仪式中需由儿孙承担的环节却是一样也没少。守灵者是油麻地小学的全体老师,封丁用的是桑桑的头发。“给秦大奶奶送葬的队伍之壮观,是油麻地有史以来所没有的,大概也是油麻地以后的历史里不可能有的。油麻地小学的老师与孩子们,一个挨一个地排着,长长的队伍在田野上迤迤了一里地。”^{[14]131-132}在这里,油麻地村民,因秦大奶奶的丧葬仪式,彼此之间的情感具有了血缘般的亲密性。这种独特的丧葬仪式,我们在鲁敏小说中也可看到。《思无邪》中参加兰小丧葬仪式的不仅有兰小的亲人,还有东坝的村民。兰小身有残疾,且天生智力有缺陷,东坝村民与之并无太多接触。但在兰小葬礼上,人们还是都流了泪。

新世纪盐城乡土小说对乡村共同体家庭化的书写方式,既是一种理想主义乃至浪漫主义的想象,也是对现代人孤独感、虚无感、不安全感等生存体验的现实回应。现代社会的高度流动性直接导致个人与他者的关系越发脆弱,人因失去群体的依靠而陷入孤独、迷惘境地,现代人的精神荒芜也就成为当下的时代症候。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世纪盐城籍作家对乡村美德的挖掘、提炼,对乡村情感的发掘,对乡村共同体家庭化的浪漫想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共同体叙事的田园诗基调

田园诗是“讴歌农村宁静悠闲生活的牧歌”^{[18]71},致力于探索“大自然的客观审美价值”^{[18]74}。“与其他题材相比,山水田园诗的表现艺术发展得最为充分”^{[18]350},并形成了独特的美学范式,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乡土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废名《竹林的故事》、沈从文《边城》、汪曾祺《受戒》等皆以“天人合一”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书写乡村生活的恬静、自然、恒久。新世纪盐

城乡土小说承续了这一创作脉络,亦以建构田园意象、追求田园意境、塑造田园性格的方式,营造传统田园诗恬静、悠闲、自在的美学氛围。

(一) 田园意象

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百年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虽已被反复言说,但新世纪盐城籍作家依旧未放弃探索其新意之可能性。李有干写农民播撒的稻芽:“破壳而出的稻芽躺在清冽的水中,粒粒可数,犹如刚从母体中脱出来的婴儿,还没有能力从泥土中吸取养分,全靠水维持稚嫩的生命。”^{[11]70}小说中的稻芽虽由农民播撒,其动人之处却是出于知识分子的眼光。易言之,小说中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既非功用,亦非一体化,而是具有一定审美距离的诗意观照。

李有干看待世界的方式,我们在其他盐城籍作家笔下也常见到。鲁敏写田里的西瓜:“嫩黄色的花骨朵像痴情的女人似的,这里冒出一朵,那里冒出两颗。又像最纯洁的星星似的,在深绿的藤蔓上,天真无邪地睁着圆圆的眼……”^[19]鲁敏笔下的农作物常是娇羞的少女,曹文轩则偏爱用“金黄”再现水稻、麦子的耀眼夺目。曹文轩写水稻:“那是一个少有的秋日的黄昏。田野上皆是金黄的稻子,在金辉中散发着成熟的气息。”^[20]曹文轩笔下的麦地:“一块地一块地的小麦,转眼间就变得金黄,太阳一晒,空气里弥漫着麦香。一块地一块地的大麦却还是绿的,与小麦地不规则地互相镶嵌,金一块绿一块,一块金一块绿。”^{[21]40}

盐城河道交错,作家以家乡为背景进行艺术创作时,自然无法绕过河水、湖荡。除了上述粮食意象外,新世纪盐城籍作家对水意象亦尤为关注,且倾注了其对故乡宛转低回的诗意柔情。曹文轩写水时尤为偏爱银色。同为黄昏,《细米》中的河水不是金色,而是银色:“此刻,只有一丝小风轻轻地吹过,河面上起了细密的波纹,仿佛有成千上万条银色的小鱼游到了水面上。”^[22]柔和的银色,流动的皆是脉脉温情。“流水的哗哗声与芦苇的沙沙声,仿佛是情意绵绵的絮语。”^{[23]8}

水意象不但易于承载作家对故乡的诗意柔情,而且易于表现作家对故乡豪迈、宏阔的想象,其中以芦苇荡意象最富有代表性。李有干《芦苇荡》第一章标题虽为“荒原”,但内容却无荒凉之感。小说写一家三口如何开垦荒地,如何奇遇土匪,如何顺利脱险。“广阔的芦滩无休无止地铺向天地”^{[11]2},为惊险的故事情节营造了一种深广、悠远的意境。曹文轩写芦苇荡,更似在泼墨挥洒胸中豪情。“一望无际,那边是海,浪是白的,这边也是海,草海,浪是金红的。海里的浪涛声是轰隆轰隆的,草海的浪涛声是呼啦呼啦的。”^{[23]112}

(二) 恬静意境

新世纪盐城乡土小说普遍追求宁静、闲适的意境,其中以曹文轩小说最具有代表性。曹文轩小说中的乡村如一汪湖水,中心人物因湖水的滋养得以外出游历,后又复归乡村。人物经历虽有波澜,恬静、美好却始终是小小说的叙事基调。《草房子》中的秃鹤一度迷失于自我的感受,陷入叛逆、逃离、孤独的困境,最终通过自己的努力,为集体带来荣誉,实现回归集体之成长。显然,小说中秃鹤的成长并非简单的背叛与回归,而是个人与集体的互相成就。个体因集体而获得安全感,集体因个体变得更具活力。《青铜葵花》虽写了蝗灾与饥荒,其叙事重心却是写青铜一家与没有血缘关系的葵花间彼此体谅、支持、付出的美好情感。《细米》写细米一家对梅纹的无私关爱,写梅纹对细米雕刻的尊重与支持。小说呈现了每一个人人性深处最美好的一面。曹文轩的小说都是从日常生活琐事处发现人性之美好,这既体现了作家生命体察之细微,又显示了作家浪漫的理想主义情怀。

鲁敏东坝系列小说营造的意境亦甚幽静。《逝者的恩泽》中的陈寅冬意外去世,其妻红嫂与情人古丽被命运捆绑在了一起。小说没有写二人的对立、冲突,以探测人性之幽微,而是细腻地

描写了二人如何带着子女,由小心试探到组合成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家庭虽异于常规伦理,却因彼此间的体谅、关爱,显得比一般家庭要更为稳固、温馨。可以说,在鲁敏眼里,人与人之间超越血缘关系的关爱,亦可以在对立的关系中生根发芽,不断延展,直至辐射整个村庄的每一个村民。

四、作为边缘性存在的现代理性话语

新世纪盐城乡土小说写的虽是乡村生活,但现代生活方式却以不同面貌在乡土世界中出现。其中最为常见的是,叙述现代物质文明如何在乡土世界中蜿蜒流淌、汇聚成河。鲁敏笔下的东坝世界,便是这样的存在。东坝的“土路给铺上了石子,木桥成了水泥桥。村里弄起了个小厂,一开始是地毯厂,现在是绣花厂”^{[24]202}。甚而,东坝的相关部门有了“与大都市接轨的气魄”,并且“要注册剪纸商标,要成立剪纸艺术公司,要包装与策划,要搞文化产业,要走向国际舞台”^{[16]299}。从这个层面说,鲁敏笔下的东坝世界是写实的,对应的是现代物质文明进入乡村的社会现实。然而现代物质文明只是鲁敏东坝想象的起点,却不是终点。

鲁敏笔下的东坝人虽“都有了自来水、电灯、电视,一部分人家添了电话与电扇,个别的,还买了空调”,但“这些时新的东西,也不大会用,或者,用了,并不觉得特别好”^{[24]202}。可见,东坝人对现代物质文明持的是一种既接受又拒绝的态度,接受它们进入日常生活,却拒绝认同现代物质文明所挟带的现代理性价值观。这种想象方式的直接结果是,现代物质文明在东坝世界只能作为景观的存在,与东坝人无法形成“操心”的生活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鲁敏笔下的东坝世界虽处乡村巨变的时代,却也有着自足的文化体系。

我们也需要看到的是,鲁敏以一种强势的叙述姿态,拒绝现代理性价值观进入乡村的任何可能性。这种想象方式反映出作家对乡村共同体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持续浪潮中的存续,明显缺乏足够的信心。关于乡村如何应对现代化进程这一问题,曹文轩所持观点与鲁敏一致,都倾向于建构乡村共同体,保持乡村文化的自足性。不同的是,曹文轩用讲故事的方式,论证了人的生命依托只能落脚于乡村共同体,而非现代理性价值观。

曹文轩小说以成长小说为主。少年之成长,首要面对的是自我意识之觉醒。而自我、个体、主体,皆为现代理性价值观的基本关键词。曹文轩在讲述少年成长过程时,率先处理的亦是这个问题。《草房子》中的秃鹤某一日突然意识到自己秃头的独异性。于是他开始拒绝别人摸他的头,“谁碰,他就跟谁急眼,就跟谁玩命。人再喊他秃鹤,他就不再答应了”^{[14]2}。在讲述秃鹤自我意识觉醒问题时,与一般成长小说叙述个体如何形成独立人格的过程不同,曹文轩更加重视探讨主体意识形成的必然结果,即主体与周围世界的对抗。秃鹤意识到身体的差异后,主动与共同体分离,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也由一体转变为剑拔弩张。为了表达自己的不满,秃鹤在学校广播操表演时故意摘掉帽子,露出自己的光头引发骚动,导致一向稳坐冠军宝座的油麻地小学失去了追逐冠军的可能。《根鸟》中根鸟的成长亦始于自我意识的觉醒。14岁的根鸟发现一个名为紫烟的女孩身陷大峡谷的求救信,此后大峡谷与紫烟就成了根鸟梦中的常客。根鸟将他的所见、所梦告诉好友、父亲,大家一致认为根鸟“脑子好像出了毛病”^[25]。父亲用人生经验告诉根鸟,他的所见与所梦皆是虚妄。好友与父亲对根鸟的不理解,使根鸟“独立存在,与世界分离”^[26],个体意识的苏醒,也就成了启动根鸟成长机制的决定性一环,并直接左右着根鸟的成长方向。

如果说现代个体意识的觉醒,是启动曹文轩小说中少年成长机制的钥匙,那么共同体则是成长机制的核心内容。《草房子》中的秃鹤主动要求扮演伪军连长的角色,大冬天刻苦练习,最终演出取得了成功,为油麻地小学带来荣誉,也赢得了大家的尊重。杜小康靠沿街吆喝贩卖日用品,承担起家庭的所有开销。他与同学的关系也由过去的对立变得和谐。《山羊不吃天堂草》中黑罐

走后,明子陷入良心的折磨,遂接回黑罐,并承担黑罐的一切开销。自此之后,明子、三和尚与黑罐的关系由原先的各怀心思,变为彼此关爱,从而形成一个牢固的共同体。曹文轩笔下的秃鹤、杜小康、明子等人身上的现代个体意识最终都以不同方式,与周围世界重新相遇,融为一体。易言之,在曹文轩小说中,人物的成长方向不是现代价值观所推崇的自我、个体、主体,而是以传统乡村文化精神为旨归的共同体。

可见鲁敏、曹文轩等小说中的现代理性话语虽无处不在,但处于边缘地位,并非是推动叙述的主导性力量。现代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解决了此前所有文明形态不曾解决的物质匮乏的难题;现代理性价值观使个人得以从历史地表浮现,获得前所未有的人格尊严。这些在新世纪盐城乡土小说中,或被具象化为现代家电,而家电主人的身份使得小说人物在面对现代物质文明时,拥有着绝对的掌控权;或被简化为试图融入共同体的过程中,所要克服的一道道人生难题。可以说,在新世纪盐城乡土小说中,现代理性价值观与传统乡村价值观虽“相遇”,却未能展开实质性的对话。

五、结语

新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全球化的深入推进,中国开始进入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因此,新世纪盐城乡土小说中形成了有别于此前乡土小说的社会和心灵镜像,这些小说不仅关注现代物质文明进入乡村的社会现实,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乡村文明造成的巨大冲击,而且尝试重构乡土文化记忆,重建具有现代意义的乡土共同体,探索可与现代文明对话的文化脉络。从某种程度上说,新世纪盐城籍作家的这些尝试,为我们反思现代性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然而,新世纪盐城籍作家对乡村共同体家庭化、田园化的乌托邦想象,对现代话语丰富性、驳杂性的简化,使得其构建的乡村共同体富有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易言之,新世纪盐城籍作家对现代性的反思,只能给予一种精神性的抚慰,并不具有现实的有效性。

南希在讨论现代共同体时指出:“共通体不是共同的一个存在,而是存在于共通,或者说,是这一个与另一个的与在,或者共在,与在指的是既不在独一存在之内,也不在其外的某种东西。”^[27]也就是说,只有以现代个体性为基础的共同体,才有面向未来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说,盐城籍作家虽认可现代物质文明与现代价值观的存在合理性,但其建构的共同体却是以传统乡村美德、传统乡村情感为核心内容。通过对现代理性话语的边缘化处理,新世纪盐城籍作家笔下的乡村共同体普遍呈现出镜中花、水中月的虚假性质。新世纪盐城籍作家如要走出这一叙述困境,或许只有回到“这一个与另一个的与在”的视野,基于现代个体性,在优秀乡村文化中汲取建构共同体的力量。

参考文献

- [1] 曹文轩. 童年[M]//曹文轩. 水边的文字屋. 北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0.
- [2] 王尧. 民谣[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21.
- [3] 鲁敏. 记忆望着我,生活望着我[M]//鲁敏. 时间望着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9:159.
- [4] 哈布瓦赫. 论集体记忆[M].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89.
- [5] 李有干. 水路茫茫[M].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7:后记.
- [6] 王尧. 返回与逃离[M]//王尧. 时代与肖像.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
- [7] 曹文轩. 猪[M]//曹文轩. 追随永恒.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8.
- [8] 曹文轩. 乡村情结[M]//曹文轩. 追随永恒.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5.
- [9] 王尧. 疼痛的记忆[M]//王尧. 时代与肖像.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107.

- [10] 曹文轩. 草房子[M]. 南京: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5.
- [11] 李有干. 大芦荡[M].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 [12] 赵园. 地之子[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21.
- [13] 鲍曼. 共同体[M]. 欧阳景根, 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104.
- [14] 盐城县地名办公室. 江苏省盐城县地名录[M]. 南京:江苏省测绘局, 1983.
- [15]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11.
- [16] 鲁敏. 纸醉[M]//鲁敏. 思无邪.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
- [17] 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盐城市志[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8:2666.
- [18] 葛晓音. 山水田园诗派研究[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3.
- [19] 鲁敏. 颠倒的时光[M]//鲁敏. 思无邪[M].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83.
- [20] 曹文轩. 田螺[M]//曹文轩. 甜橙树. 北京:天天出版社, 2012:114.
- [21] 曹文轩. 天瓢[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
- [22] 曹文轩. 细米[M]. 南京: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4-5.
- [23] 曹文轩. 青铜葵花[M]. 北京:天天出版社, 2013.
- [24] 鲁敏. 思无邪[M]//鲁敏. 思无邪. 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8.
- [25] 曹文轩. 根鸟[M]. 北京:天天出版社, 2017:36.
- [26] 弗洛姆. 逃避自由[M]. 刘林海, 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9:18.
- [27] 南希 J-L. 无用的共通体[M]. 郭建玲, 张建华, 夏可君, 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6:243.

Rural Memory and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n New Century Local Novels: Taking Yancheng Writers as Examples

XIA Zhengju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cheng Teachers University,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China)

Abstract: Crossing the maze of memories to reach a romantic, ideal, and beautiful rural community that is different from reality is the basic narrative path of the new century's Yancheng local novels. The rural community in the novels mainly consists of traditional rural virtues as elements, characterized by family-oriented and pastoral representations. The ubiquitous modern rational discourse reflects the new century Yancheng writers' attempts for dialogue with social reality. New century Yancheng writers reconstruct rural memory, rebuild local communities with modern significance, and explore cultural contexts in dialogue with modern civilization. To some extent, they provide us with another approach to reflect on modernity.

Key words: new century local novels; rural memory; community; writers from Yancheng

〔责任编辑:王建霞〕